

谈中国的合作翻译

刘立壹 山东建筑大学

摘要：中国翻译史可以说是一部合作翻译史，从持续千年的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再到晚清的翻译高潮，合作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时期，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译者的修养不同，合作的策略也有所差异，各具其时代的特征。展望新时期正方兴未艾的翻译盛事，合作翻译因其特有优势还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合作翻译；译者；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2)04-0089-05

合作翻译，顾名思义，即由两位或两位以上译者合作进行的翻译。纵观中国翻译史，尤其是20世纪之前的翻译，中国的译作主要由合作翻译产生（译场由多人参与，更应归为合作翻译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持续千年的佛经翻译，还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清末戊戌变法前的翻译，合作翻译都是主流。这种模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袁锦翔（1989）、郑延国（1995）、张德让（1999）、王正（2005），但少有人从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的合译传统作出梳理。合作翻译的模式和策略关键在于译者，而译者又受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本文将从译者修养角度，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各个时期合作翻译的特点，并探讨合作翻译在中国现在的文化交流中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作用。

1 译者、语境与合译

关于合格译者应具备的条件，古今中外不少译家和学者都给出自己的定义。这些定义不是绝相迥异，而是大致相同，下面我们看一下隋代高僧彦琮和当代美国翻译家奈达对译者条件的定义。彦琮称译者须有八备：“（1）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

此文。”（汤用彤，1982：76）奈达认为一名译者首先最起码必须熟悉原语。第二，必须精通译语。第三，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第四译者必须有“移情”本领，即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第五，必须具有语言表达的才华（谭载喜，1999：237-238）。二人虽一中一外，一古一今，但都是从事的宗教经典的翻译，一是佛经，一为圣经，都是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译者必备的品质。虽然彦琮更加强调整译者的品质和对待佛经翻译的态度，但仔细阅读来两家定义却主旨相似，即译者要精通源语和目的语，要熟知所译领域（荃晓三藏，义贯两乘），译语要表达流畅并能较好地传达原作者的意图，要“不坠彼学”，“不昧此文”。但综观我国的翻译史，情形较为复杂，译者的职能多由两人或多人承担。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合译的方式也不同。但基本上是参与合译的译者或精通源语（多为来华外籍人士），或精通汉语（多为本土土人学者），偶尔也有双语兼擅的人，但在双语修养上却有强有弱，欲臻佳译，辅助不可或缺。各方各发挥其所精通语言的优势，互相合作，各取所需，各展所长，共同协作，以完成文化的交流融通。译作质量，取决于合作翻译者的双语修养，以及他们对所译领域的了解程度。而这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又息息相关。东汉末佛教初入中国时译才难觅和隋唐佛教兴盛时译事大兴的合译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刘宓庆谈到翻译中语境对意义的决定作用时，提出“适境”（fitness to contextuality）的概念，即意义既要微观语境（指从搭配即词组、分句、

作者简介：刘立壹，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史、弥尔顿研究。E-mail: liuliyisd@163.com。

句、短句、文本或篇章直至题材)又要对宏观语境(指非语言因素,包含社会、文化、历史因素)适应,受两者的制约(2001:330)。实际上,译者翻译形式和策略的选择以及合译的产生及应用都要为了“适境”,都是社会、文化、历史这一宏观语境选择的结果。译者本身要积极地适应社会、历史、文化宏观语境,适应的结果便是合译形式的产生。因各个时期宏观语境不同,译者所具备的上述译者的条件也不同,合译的形式不同,译作的读者接受和反应也有差异。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来探究译者、语境与合译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2 不同时期合译的特点

梁启超把东汉末至盛唐的约600年佛经翻译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外国人主译期;第二,中外人共译期;第三,本国入主译期。(梁启超,1999:3794)梁氏随后引用了宋高僧赞宁的话来说明这三期的情形,“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覩面难通……”(同上)以安世高、支娄迦讖为代表。“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同上)以鸠摩罗什、觉贤、真谛为代表。“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鹄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梁启超,1999:3795)以玄奘、义净为代表。这三期的分类可算精当。佛经翻译主要通过译者合作来进行,合作翻译是三期的共同特征,但各期又有其各自特点。观察这三期,可以注意到一种趋势,即译者对佛经翻译本质的认识逐渐深入,“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较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王克非,1997:14),同时,合译的形式逐渐合理化、有序化,由私人散译到有组织的合译。无疑,翻译形式的合理化促进了对翻译本质的了解,有组织的译

场提供了一个平台,借此,译者们可就翻译的一些问题交流和讨论。有关翻译的精辟论述和当时的译场是不无关系的。在佛经翻译理论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法句经序》,实际上代表了作者支谦在《法句经》合译过程中对佛经翻译的认识、反思、和思考。而道安“五失本三不易”更是对当时合译佛经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东汉三国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撞击、吸收阶段(季羨林,1993:4)。佛教的态度与所倡导的伦理和中华文化有相悖之处,为避免正面碰撞,佛教托名黄、老,依傍道术,“附于方术以推行,释迦自亦为李老之法裔”(汤用彤,1983:40)。到东汉末年才渐与黄、老相分离,走上独立发展之途,到三国时佛法才流传渐广。但这一时期佛教民众基础较弱,信徒较少,此种情形下东来的胡僧不精华言,而中土笔录之人既不通胡语,又不晓佛理,两方合译,出现“咫尺千里,覩面难通”就不足为怪了。僧祐论早期译经时说:“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乎执笔。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14页)把问题分析得很透彻。口授、笔录两相阻碍,难出佳译。但此时期也出现了可称道的合译范例,如安玄与严浮调,安玄通华语,浮调知佛法、擅胡言,两相合作,自然气象不同。但此期的合译整体上呈现随意性,合作的译者随遇而译,译经零散不系统。

下一个阶段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尤其在西晋以后,胡人入主北方,胡汉杂居,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迅速普及;再加上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佛教因果报应等教义浅显易懂,渐入人心;且佛教的仪式、戒律也规范起来。(葛兆光,2009:27-30)这些因素使得佛法大兴,通佛理、晓胡言的人才不乏其人,这就为高质量的合译提供了条件。功劳最卓著的当

属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觉贤、真谛。这些高僧译经皆有多名助手,如竺法护的传译者(职责为转胡为汉)有安文惠、帛元信等,而笔录者更有多人,以聂承远、聂道真最为知名。竺法护长期居华,译经后期可以不用传译,直接转胡为汉,口出晋言,笔录如聂道真精通梵文,自己曾译过一些小部经典。东晋的鸠摩罗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译经大师,规模系统的译经自罗什开始。他“手执胡本,口宣秦言,而释异者,交辨文旨。……与诸宿旧义业沙门……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缪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292,293页)。从姚秦开始,大规模、有系统的译场翻译得以开展。译经分工日益精密。译场中有证义的,看译文与原文是否相符;有总勘的,在译经完毕后,复校全文。译场中主译、助译合理分工、互相协作,“宣者已能习汉语,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遂典妙文,次第布现”(梁启超,1999:3794)。此时虽不能做到水乳交融,但已是妙文迭现了。如常引的一个例子所示,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罗什重译此经,至此处时,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而在言过质。”僧睿曰:“将非人天交连,两得相见。”什曰:“实然。”(释慧皎,1992:245)主译、助译皆深通佛理,两相商榷,译经质量大为提高。但此时译经尚未臻于完善,一是因为译场组织尚不完备;二是因为中外共译,梵僧虽已通汉语,但两相转换,仍有阻隔。如罗什般天才人物也时常被其弟子批评“与华言大格”(汤用彤,1983:295)。

隋唐时期,佛法广兴,译事大盛。一改前期以被动受经为主,西行求法的僧人不绝如缕,佛经原本多由求法的高僧从天竺带回,避免了此前西域传本的转易错讹。高僧如玄奘、义净皆久留印度,成为具有彦琮八备的翻译巨匠。再则,译

场组织愈加健全、完善。参与译场人数大大减少,之前译场动则几百上千人,如鸠摩罗什有助手三千人,到了隋唐时代,译场人数锐减,一般二三十人,以玄奘译场为典型代表的译场职司有九个:(1)译主,即掌管译事,译主题其名氏;(2)笔受,受所宣译之义而著于文,亦曰“缀文”“缀辑”;(3)度语,传所宣义,凡译主为外人,时则需之;(4)证梵本,校所宣出,反证梵本;(5)润文,依所笔受,刊定文字;(6)证义,证已译之文所述之文;(7)梵呗,开译时宣梵呗,以为庄严;(8)校勘;(9)监护大使,监阅总校,即钦命大臣,译本由之进上。(汤用彤,1982:67)隋之前,译场翻译采用“译讲同施”,主译先用胡语或梵语诵读原文,然后翻译成汉语,主译如不通汉语者则通过传语译出,由笔受记录。主译随译随讲,同时和助手“交辨文旨”、谘问辩难,使佛理为众人所明晰,而且助手记下的译文在最后佛经定稿时可起到参考作用。但交相辩难,译经效率较低,到隋唐时,译场形式更加紧凑,参与者皆为精通佛理的高僧大德或士人学子,分工明确,各有职属,讲经辩难从佛经翻译中分离出去,虽人数少,但效率大增。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扶槎东来,目的是把“天国的福音”遍撒东土。经过摸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后,制定了走“上层路线”的学术传教策略。弃僧装,着儒服,学儒学,以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并觐见皇帝,结交名士,翻译西书。合作译书成为耶稣会士迂回传教策略之一种。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多是天主教徒,欲以合作译书,系统引入西方科学,以改变性理空谈,达经世致用之目的。在此背景下,合译有其时代特点。合译基本是中西合作,耶稣会士口授,中国学者笔述。译著多为科学著作,以天文、数学为主,旁及物理、工程机械、冶金、生物甚至哲学学科。编译为主,原书不局限于一本。合译的情形可以从徐光启所

上呈的奏疏中观察得到:“臣等藉诸臣(耶稣会士——笔者加)之理与数,诸臣又藉臣等之言与笔。功力相倚,不可相无。”(徐光启,1963:364)此期合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中方译者不仅是“旁涉坟史,工缀典词”的学者,更是中国当时一流的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梁启超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4432页)。李之藻不仅翻译西书,还根据西方天文学创作出专著《浑盖通宪图说》(1607)阐释周髀浑天、盖天。利玛窦对之评价甚高,在他写给罗马教士的信中说:“神父,你可以看看这本书,你只要看书上所有的图,就可以知道这个民族的才智。”(罗光《利玛窦传》,转印自马祖毅,1998:268)中方译者这种深厚的专业修养是合译成功的基石。

中方笔述在明末科技翻译中的重要性更可在晚清的西学翻译中略窥一斑。1894年前,翻译的情形和明末清初相仿,翻译以“格物”之学占多,多由官方主持翻译为主,翻译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为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也从事译书工作。一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西合译,西士(主要是基督新教传教士)口译,华士笔述。同是官办翻译机构,译书方法相似,但译书质量却是相差悬殊,关键在于笔述。同文馆笔述大都是学生,而制造局的中方译员,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贾步纬、张福僖等人,都是科学家。李善兰与伟列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伟列亚力在序文中说,因所据英文本“校勘未精,语讹字误,毫厘千里,所失匪轻。……(李)君因精于数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于是相与翻译,余口之,君笔之,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君之力为多”(马祖毅,1998:351)。由此可见中方译员敬业精神与精湛的专业知识在翻译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专家型笔述毕竟只占少数,多数

中方译员缺乏专业知识。传教士口译者多不是所译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所译多现学现译,与徐寿等科学家合译倒还无妨,如合作者是同文馆的学生,他们中文不精,专业又不通,译文之粗制滥造就可想而知了。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抨击当时译者“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张静庐,2003:30)

不能不承认,此期参与合译的新教传教士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学术背景要弱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大都是精英人物,学有专长,有的来华前即已蜚声欧洲。而清末的新教传教士则不然。大学毕业不久的理雅各赴马六甲传教时,就过对传教士的知识储备耿耿于怀(Girardot,2002:41)。这也可从当时士人的著述中得到证实,如在墨海书馆工作多年、和慕维廉合译过《大英国志》的蒋敦复就说过:“若夫天教,明季始入中国,利玛窦南怀仁诸人,皆通天算輿地之学,材艺绝伦。其所著《七克》等书,切理履心,颇近儒者,故当时士大夫乐与之游。今之教士,其来者问有如利、南辈其人者乎?无有也。所论教事,荒谬浅陋,又不晓中国文义,不欲通人为之润色,开堂讲论,刺刺不休,如梦中呓。稍有知识者,闻之无不捧腹而笑。”(王明伦,1984:33)蒋敦复对新教传教士学养不足,而又不能放手给儒者去润饰极尽鄙薄不满之情。

甲午海战后,中国对西学的兴趣由几百年来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大批留学生或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既学习了语言,又掌握了专业知识,成为翻译的生力军,这和法显、玄奘、义净苦心孤诣、西行求法是截然两重天。译书原本不再局限于欧美,留学日本,通过日本转译西方著作曾一度成为主流(费正清,1985:409)。此种情形下,具有彦琮八备的全面译才也大盛于前,不需辅助即可独立承译,合译

不再充当主角。但此时，也有精彩的合译崭露头角，如林纾的翻译。林纾不懂外语，却和多人合译英、法、俄、日等多国一百三十八部小说。他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实赖于几位优秀的口译者之力，“假使林氏少了他（魏易-笔者加），那么决不会得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寒光《林琴南》，转引自马祖毅，1998：433）。林纾翻译的成就和几位优秀口译合作者息息相关，但也受到一些不合格口译者的负面影响，因他不懂外文，对外国文学、文化也不甚了解，致使所译之书中有许多都是些二、三流的作品。林纾虽为笔述，他参与合译的作品，我们都泛称为林纾的翻译，而佛经翻译时期，我们一般却以口授者或出经人（口宣佛经者或转胡为汉者）为佛经的译者。原因或在于，出经之人“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所谓译场之助手，均实所受义理之弟子”。（汤用彤，1983：210）口授者同是担当讲解佛经义理，有时并授佛法与戒律，这在佛经汉译早期尤其如此。所以口授者在译经中地位最为显要。而在林氏参与合译的小说中，林纾用力最深，对一些作品的主旨把握、细节刻画皆很到位，“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都可以觉得丝毫未易”（郑振铎，1924）。林氏生于清末，目睹国家贫弱，欲以小说启发民智、改革风气。心系民族兴衰，译述的小说优美简洁，不落窠臼，自在情理之中。所以林纾与他人合译的作品中，林纾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却不可贬抑其合作译者的功绩。

3 总结与思考

纵观中国翻译史，大多数时间，译作皆由合译所出。但每一时期的合译因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而又具时代特征。佛经翻译由最初的两三胡僧偶遇而译到后来官方支持的组织严密的分工合译，由胡僧、梵僧纷纷东来传法、译经为主，到中国僧人远赴西域、天竺

求法并成为译经主角，合译形式逐渐合理有序，译经质量趋向提高。官方提倡，佛法广传，信众大增，为潜在的合格的译者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明末清初的合译与清末甲午前的中外合译有诸多相似之处。译介西书皆是满足社会所需之举，虽目的不尽相同。内容以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为主。所译上乘之作由科学家或相关专业专家笔述，他们虽不通外语，但以其精湛知识和钻研精神弥补了这一缺陷。甲午之战后，兴趣由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留学归国者渐多，国内也培养了一些外语人才，可独立翻译者渐多，译事兴旺，和唐初佛经翻译的盛况有相似之处，但在译书种类、数量等方面又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合译不再是主流。

五四之后直到今天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马祖毅，1998：总序1），用“翻译爆炸”来形容毫不为过。但对中国文化贡献良多的合译形式是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它是否在哪些方面仍有其价值？历史上合译盛行，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有翻译的需要，但却缺少彦琮、奈达所说的那种独立翻译的人才，即使鸠摩罗什，也要借助僧睿、僧肇。如玄奘，“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道宣语，《续高僧传》，马祖毅，1998：65）百年千年难遇一位。为培养完备的译才，唐义净写梵汉对照的《梵语千字文》，北宋时选儿童学习梵语，明初设四夷馆，清末设同文馆及各类学校，但真正译才质高量多的时期出现在五四之后，兼通中西的译者远多于前，单打独斗即可，合译遂失去其主流地位。

但新的土壤也孕育了新的问题。最近的这次翻译高峰期的一个特点是由引进为主，到引进、推介（汉译外）并重。把中国文化经典向国外传播，使世界了解中国，对于中国文化崛起、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这一过程却不顺利，走得磕磕绊绊。一般来说，翻译多由目的语国家的译者承担，因为一门外语理解相对容易，而要用外语表达则较难。因此大多数译者从事的都是外语到母语的翻译（崔永禄，2007）。从这个角度说，中译外的工作由精通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译入语国家的人士来担任较好些，但眼前这种担负中译外的合格译者短时间难以大量培养。已译成外文的中国名著难以令人满意，而汉译外工作又不可耽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合译的方式，以充分发挥外方译者母语表达的优势和利用中方译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最大程度地避免对作品文化上的误读？□

注释

《法句经序》收入梁·僧佑所编的《出三藏记集》卷七，其意义和作用梁启超、胡适和钱钟书等都有所论述，详细内容可参看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000年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7-9页。

详细内容，参见曹仕邦《译场中国古代翻译佛经严谨方式》，《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第7期，74-77页。

参考文献

- [1] 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s Oriental Pilgrimag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2] 曹仕邦. 译场——中国古代翻译佛经严谨方式 [J]. 中华佛学学报, 1994(7): 74-77.
-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崔永禄. 试论中国经典文献外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10): 13-16.
- [5]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6] 葛兆光. 《魏书·释老志》与初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法 [J]. 世界宗教研究, 2009 (1): 27-30.

- [7] 季羨林. 中印文化交流史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3.
- [8]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9]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10]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11] 释慧皎. 高僧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2]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 [M]. 苏晋仁, 萧鍊子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3]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14]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5]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6]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7] 王明伦. 反洋教文书揭贴选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
- [18] 王正. 翻译中的合作模式研究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 [19] 徐光启撰, 王重民辑校. 徐光启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20] 袁锦翔. 论中外人士合译——兼谈文献中译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9(3): 53-58.
- [21] 张德让. 合译, 合一 [J]. 中国翻译, 1999(4): 25-28.
- [22] 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初编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23] 郑延国. 合译: 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 [J]. 现代外语, 1995(4): 23-26.
- [24] 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 [N]. 小说月报, 1924, 11(15).

On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of China

Abstract: China's history of translation can be said to be a history of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lasting almost a thousand years, the sci-tech trans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climax at the end of late Qing Dynasty. As each period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hence the translators' different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strategies for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are different. When we look ahead to the booming and promising era of translation, it is thought that the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should deserve a place of its own.

Key words: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ontext

(上接88页)

-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5.
- [46] Tymoczko, M. Trajectories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Meta*, 2005 (4): 1082-1097.
- [47] Williams, Ian A. A translator's reference needs: Dictionaries or parallel texts? [J]. *Target*, 1996, 8(2): 275-99.
- [48] Wilss, 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M].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1996.
- [49] Wilss, W. *Perspectives and Limitations of a Didactic Framework for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M]. New York: Gardner, 1989.
- [50] Wilss, 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Problems*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1] 张美芳.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导读. 见C. Nord,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An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Theories Practiced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ffer an intens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teaching theories which include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and the Postmodernism Approach. It proposes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task to formulate a 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ology that is based on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which can account for the process of translator's decision-making in adop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Action Research is one of integral means to conduct the inquiries into translation teaching.
- Key Words:**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pedagogical inquiries